



評介克洛斯著「沒有援助情況下的經濟發展：探索新興工業國崛起的政策環境」

衛 民

書 名：*Development Without Aid: Growth, Poverty and Government*

作 者：Melvyn B. Krauss (Hoover Institution and New York University)

出版處：Mc Graw-Hill Book Company, New York

出版年代：一九八三年

頁 數：二〇八頁

這本書的作者在一九七八年曾撰寫新保護主義：福利國家與國際貿易，主題係探討現代工業國家所採取的福利國家政策，對這些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關係產生的重要影響。此書則探討南半球國家遭受的同樣的影響，並且由於世界經濟越發成爲一體，作者還認爲北半球國家實行的福利方案對落後國家具有負面的影響。

作者特別提到太平洋盆地地區的發展對他的經濟觀點的影響很大，當地由於採用逐步的資本主義政策，以致近二十年來經濟蓬勃發展，不僅超越同輩的第三世界國家，並且也超越已開發國家近年的表現。

本書計分十章：

第一部分討論經濟發展的國內因素，即：

一、導論

二、成長、貧窮與政府

三、保護主義與比較利益

四、供給面的發展財政

評介克洛斯著沒有援助情況下的經濟發展

第二部分討論經濟發展的全球因素，即：

五、繁榮的移轉

六、多國企業

七、福利國家如何傷害第三世界

八、違背國際收入移轉的案例

九、國際金融體系與落後國家

十、在沒有援助情況下的經濟發展：結語

現在分章敘述此書內容如後：

第一章 導論

國際上一向認為低度開發國家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LDCs) 追求經濟發展有「競爭模式」與「控制模式」兩種，但這兩個模式太過極端，因為近二十年來經濟表現突出的亞洲四小龍，除了香港是採競爭模式外，新加坡、南韓與臺灣則採取折衷的模式，作者稱此三國為「競爭性成長國」(Competitive growth state)。

這種折衷模式的主要成分與基本構想是來自「競爭模式」，但也包括了若干「政府控制模式」的元素：如一方面，它給予私人選擇與個人發明極大的空間；經濟開放且與國際市場緊密結合；大部分依照自由企業原則；稅率低、企業大致不受約束。但另一方面在適度及某些單一目標上，政府也對私人經濟進行干預，而其目的是為了促進私人經濟的成長。

作者認為把這三國與北歐福利國家進行比較，便可清楚地了解它們的性質：

(1) 在福利國家，政府干預的目標是為了收入分配；在競爭性成長國，目標則在經濟成長。也即後者著重於擴大這塊經濟大餅，而前者更關心如何分配這塊大餅。

(2) 在福利國家，政府為達到收入分配的目標，干預私人經濟的程度非常大；而競爭性成長國為了達到成長的目標，政府所作的干預則屬適度。

(3) 在福利國家，由於政府是經濟資源的主要使用者（大部分將之用於社會服務），因此稅率高；在競爭性成長國，社會服務供給較適度，因此稅率低。

(4) 在福利國家，個人的自我收穫主要靠政治方式，以別人的損失為代價；而在競爭性成長國，則靠為別人服務而自市場獲利。

(5) 在福利國家，企業受到懷疑而被政府高度約制；但在競爭性成長國，則視企業為獲得經濟以致社會目標的基本工具。

作者指出太平洋盆地這些成長國家的巨大成功，是近二十年來經濟發展上真正的新聞。

比如，以這些具有選擇性資本主義色彩國家與其他政府控制國家比較，前者的平均個人所得遙遙領先，也有人懷疑這並非政策選擇的功勞，即拿四小龍中的新加坡、臺灣、香港來說，係因為都屬中國人的土地，而中國人一向工作勤奮，善於經營，但作者認為這種說法非但具有明顯的種族主義色彩，而且也無法說明為何同屬中國人的中國大陸那麼貧困。因此作者肯定這些國家在經濟成長上所具的正確政策環境才是主要因素。而事實證明，近年來拉丁美洲的智利、秘魯、牙買加、及南亞的斯里蘭卡都改採自由市場——競爭式的資本主義制度了。

第二章 成長、貧窮與政府

從第二章到第四章，主要在探討經濟發展的內部因素。作者認為影響國家經濟的關鍵力量還是來自內部。例如一九七〇年代世界經濟停滯，唯獨亞洲四小龍却表現極佳，又例如石油危機震撼全球，四小龍在這段期間的成長率反有破紀錄的表現，作者表示，當世界各國都捲入風暴時而某些國家却能安然無恙，即說明了國內政策的差異影響極大。

在追求經濟成長上，歐美的社會民主派或自由派向第三世界所輸出的社會民主思想，對第三世界傷害很大，它主要是強調大政府觀念，要求高稅收、大量政府支出，並由政府來進行重分配。這派思想認為要刺激經濟成長，政府必須大量投資到社會總資本及公共建設上，例如投資到人力資源或交通、電力建設上，但是本書作者則認為政府的投資是果，而私人的活動是因，當私人活動需要公共建設時，公共建設才會發生作用，社會民主派却倒果為因，而由於大量公共支出需要高稅收，因此阻礙了私人的經濟活動。

其次，作者認為主張政府進行重分配是社會民主派未分辨機會平等與收入平等的區別，此舉不但阻止了私人上進的動機，也助長了地下經濟活動，作者認為企業精神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社會民主派採取重分配政策無異扼殺了這個根本。

追求經濟平等與福利國家的政策，動機或許善良，結果却毀了一國的經濟及政治，本書列舉了南美洲的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烏拉圭及非洲的迦納的例子來加以說明，這些國家由於採取福利國家政策，當其國家財政收支面臨困難時，政府却因無法違反對人民的承諾以降低福利支出，以致通貨膨脹，產生政治危機。

然而社會民主派却將上述的失敗歸咎於這些國家實行民主制度，作者不以為然，他認為是自由而非民主，導致這些國家各個不同團體爭相攘利，民主制度本身並不會導致惡果。例如牙買加、斯里蘭卡，人民在大選中都支持經濟成長，而非所得重分配的政策。因此作者認為主張照顧窮人的社會民主思想，反而傷害了國家基礎，而以經濟成長為主的資本主義途徑，反而照顧了全民。

第三章 保護主義與比較利益

第三世界的保護主義是一項限制它們經濟發展的政策。

保護主義在南方國家與在北方國家是不同的，在北方國家它是用來保護垂死工業免於死亡，在南方，則是保護幼稚工業能夠成長。但是由於濫用保護，幼稚工業却永遠無法成熟。

經濟的基本法則之一即比較利益法則，一國照理會儘量運用它所充分擁有的生產因素進行生產，然而許多落後國家却捨棄它所具有的豐富人力，而發展資本密集的工業，自由市場是與比較利益不分的，這些國家即採取違背自由市場的作法。

例如第三世界常採取進口替代政策，以人爲方式提高國內生產利益以代替進口的商品。就保護有發展前途的幼稚工業來說，此舉或許有其價值，然而幼稚工業常被用人來謀求私利，不但它本身長不大，一國最重要的企業進取精神也被戕害了，許多印度人唯有在國外才能事業騰達，即因印度國內缺乏培育企業家的環境。

出口對國內市場有限的第三世界國家極爲重要，因此保護主義——即進口補助政策(Import Subsidization Policies)——對出口的影響就很重要。亞洲四小龍採取低關稅政策、避免數量限制，外銷的表現都非常傑出，反之採取高關稅政策的國家外銷成績則很差，因爲國內商品含有高稅在內，影響出口。

徵收出口稅則是直接限制了出口，不但阻礙國內中產階級形成，也造成了大政府的問題。

由於進口替代政策造成出口品無法與外國產品競爭，最常用的補救法就是出口補貼，然而補貼的財源來自增稅，這不啻又增加了出口品的隱含稅。至於補貼政策造成官僚濫權與商人鑽營則是最嚴重的問題。

亦即由於政府干預以致有「油水」可賺，例如配額制度，商人爲求得執照，或非法賄賂，或不經濟地生產以達到標準，這種油水在第三世界國家所佔金額頗大，它却使市場經濟蒙受污名，被左派指其係爲富人及特權獲取不當利益的制度，然而作者却認爲通常是因左派追求「社會正義」、進行經濟控制，才造成了經濟油水。

在當前工業國家盛行保護主義之際，有人建議落後國家也應採取保護主義以行報復，但作者則認爲第三世界應做效太平洋盆地國家，必須堅信比較利益原則才是經營獲勝之道。

第四章 供給面的發展財政

近來盛行「供給面經濟」(Supply-side economics)，其要旨是如果要少獲得什麼東西，最好的辦法就是向其徵稅，因徵稅減低了被徵項目的供給，例如政府若以高稅率徵收代表個人努力的所得稅，則個人的工作努力就會減少。

供給面理論最有名的即拉佛爾曲線(The Laffer Curve)，根據此理論，可以導出兩種不同的政府財政路線，一是政府支出可由經濟成長供應，一是政府支出可由高稅率供應，但社會處於停滯的經濟基礎上。前者由於經濟成長，公共支出不斷增加，

而由於經濟成長，政府盈餘也增加，稅率反而降低，形成所謂「資本主義繁榮的良性循環」(benign circle of capitalist prosperity)，這是亞洲四小龍所採取的路線；相反的，則是高稅率——低成長模式。由資料顯示經濟成長最快的國家，稅率也最低，公共支出的增加也最快。

供給面經濟的第二個主題，即減少儲蓄的稅負。由調查顯示，個人儲蓄率最低的國家，投資所得稅的稅負 (investment income tax liability) 最高，而反之亦然，因為稅收影響儲蓄，必然也使資本形成及經濟成長減低。

除了減免儲蓄稅外，太平洋盆地地區的國家也避免對助長他們經濟的國際匯兌和進口資本及科技課以重稅。

就處理國際資本流動而言，亞洲四小龍有香港模式與新加坡模式兩種，前者對國內外資本採無差異政策，俱採低稅率，後者則對外資的徵稅遠低於國內資本，其典型的作法是設立「投資促進區」(investment promotion zones)，區內之外資俱可免稅。許多第三世界都仿效這種作法。

亞洲四小龍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不同的，即鼓勵外資流入。如果對外資課稅則會降低外資的回收率，使外資另覓他處投資，當然國際間所採的多非直接課稅的方式，而是採取具課稅效果的措施：(一)管制外匯；(二)規定本國人出任一定比例的管理職位；(三)延期還債或拒絕還債。上述措施係所謂「新國際經濟秩序」之主張，但作者認為一旦採取這些作法則既不「新」，也不「經濟」，更無「秩序」可言。

再就出口而言，亞洲四小龍也有香港模式與其他三國所採模式之分，前者對出口品採無差別待遇，既不課稅，也不補貼，後者則採補貼出口的作法。例如出口免稅，對出口利潤減稅……此種辦法也有問題，即如果補貼的代價大過盈餘，則不啻變成無報答的讓渡 (unrequited transfer)。

作者在此章最後舉伊朗六〇年代經濟改革失敗，終導致七〇年代政治革命的例子，說明伊朗國王 (Shah) 採取大量的政府干預措施，係違反供給面經濟的原理，顯示巴勒維國王的失敗並非由於他使伊朗進步「太快」，而是他對現代經濟所具的觀念是錯誤的。

第五章 繁榮的移轉

自本章起，作者開始討論經濟發展的全球因素。前面曾強調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受國內政策極大的影響，但並非表示國家所處的全球環境不重要。無疑的，適當了解國際經濟環境，是制訂明智的國內政策的必要條件。

此章主要在說明自由經濟中工業化的經濟中心如何將繁榮財富散佈到經濟遲緩的腹地。數百年來，開發中世界產出 (output) 的成長是依靠已開發國家的產出成長，前者迅速的成長使勞動力的需求增加，而繼續

提供勞力者則為腹地國 (hinterlands)。由於國際貿易、移民、進口資本及進口科技的流通，腹地國的勞工得以把中心國的繁榮移轉進來；由於國際貿易的關係，先進國與落後國俱有收穫，而非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的前者在「剝削」後者。

作者舉日本為例，日本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二年間已從勞力密集工業轉變為資本密集工業，日本的輕工業由於工資上升，競爭力下降，於是必須向海外投資，而四小龍此時正採取進口外資、技術而出口勞力密集產品的策略，因此成為日本輕工業所需勞力的腹地國。此種隨著國內生產因素配置 (Factor endowment) 改變，而改變貿易模式的情形即符合 Heckscher-Ohlin 理論的說法，亦即勞力密集的国家應集中生產勞力密集的產品，以之輸出來換取資本密集的產品，反之亦然。

Heckscher-Ohlin 理論不僅適用於財貨上，也適用於各種國際交流現象上；例如落後國家的教育品質不如先進國家，則可遣送學生到先進國家學習，此即落後國家以財貨代價來換取勞務；不僅勞務如此，經濟成長的社會成本，諸如污染，也會隨著中心國繁榮移轉而轉到腹地國。例如日本在一九七〇年代開始關切環境品質，因此將易污染的重化工業轉移到鄰國，而鄰近國家為獲得工作，也願意忍受隨之而來的污染。

由於勞工的國際競爭，先進國家為提高本國勞工工資，便採取：(一)關稅、(二)工作允許、(三)資本控制三種保護主義方式，以便限制外國財貨或外國勞工流入，或是限制本國資本流出。不過除非同時採取三者，否則也無法防止繁榮由未禁阻的管道轉移。

就繁榮移轉而言，作者極稱許亞洲四小龍，它們由早先日本的腹地國，轉變成今天以其他亞洲國家為腹地國的中心國，繁榮移轉的理論活生生地在它們身上得到印證。

第六章 多國企業

多國企業是將繁榮由工業國家轉移到低度開發國家的主要工具，它轉移科技及資本到低度開發國家，使低度開發國家製造出口產品而獲得就業機會，它具有整合世界經濟的作用，但由於它的特性受到批評者的誤傳，指稱它向低度開發國家轉移了「不當」的科技，並且使外資投入錯誤的工業，甚至更說它損害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稅基，作者對這些批評深表反對。

作者認為，批評者反對多國企業自高稅率國避往低稅率國，是未弄清私人企業謀利的本質，況且規避政府管制並非即有害社會利益，因為社會利益和政府利益並非同一事情。批評者認為多國企業脫出國家的管制是令人擔憂的事，但作者却表示，在現代世界中不受控制的是政府，而非多國企業，反倒是多國企業使政府受到競爭的壓力，對人民控制政府有幫助。

以「工作輸出」(job exporting)的說法批評多國企業將工業國的私人資本流出，就好像那種以關稅限制勞力密集產品輸入的作法，一樣有違比較利益，其對工業國的工人固然有利，却有害所有的國家。

另外，南方國家也會採保護主義、防止資金流動，而對多國企業流入的外資課稅，如此造成外資他移，形成本國的資本缺乏

，利息增加，結果是：對外資徵稅，反而造成國內人工負擔的增加，最後造成國際經濟受損，因為北方國家受工資上升之害，而危害其「成長發動機」的能力，連帶也無法將繁榮轉移到南方。

左派常以多國企業所雇用第三世界工人的工資不如先進國，而批評其為剝削性工資，但作者認為這是供需法則使然不足為怪，反倒是透過這種方式，多國企業提供了第三世界工作機會；另外，作者也反對人們批評多國企業使用童工是「文化帝國主義」的說法，他認為如果雇用童工是罪惡，第三世界國即應有法律保護童工，多國企業不應單獨受責。

批評者又認為多國企業協助推翻智利左派政府是「不道德」，作者認為有這種批評出現，並非因為批評者在袒護左派，而是他們袒護政府，作者則認為多國企業以私人機構能制衡政府，是其對世界經濟的貢獻。

對於批評多國企業轉移「不當」科技到第三世界（因為他們認為只有當地人才了解當地的科技），作者很感不解：為何只有當地人才了解？或，難道只有批評者才了解當地的需要。他認為這種批評反映社會民主派人士的意識，他們反對私人機構能像政府一樣具有控制科技的情形。

作者表示，即使多國企業在第三世界的投資「不適當」，例如在落後國家投資無效率的資本密集工業（而非勞力密集工業），係因受到當地政府對此工業補貼的誘惑所致，因此是大政府，而非多國企業，應受責備。

第七章 福利國家如何傷害第三世界

北方福利國家以第三世界的保護者自居，他們以極大預算援助第三世界，以此作為彌補早期資本主義入侵第三世界犯罪的「良心錢」，然而福利國家不必另找代罪羔羊，他們本身實行的福利國家制度，對落後國家的經濟就有很大的不利。

福利國家實行的「工人權利」(workers' rights) 方案即是最大的一個。該地的工人不僅擁有各項公民權，並且擁有諸如選擇工作項目、地點及享有最低消費標準制度的「工人權利」，如此政府必須補貼產業，防止產業收縮，而這些國家工人所拒絕的減薪、改換工作地點，則經由國際經濟活動的轉換，由落後國家的工人承受。由於後者出口受到前者影響，以致形成第三世界與福利國家之間的嚴重衝突。

福利國家的政府成長也限制了落後國家的出口，因為政府補貼工人需要徵稅，影響落後國商品進入福利國家以滿足其需求，同時這些政府多優惠本國產品，國外進口貨物因而受到不利的影響。

福利國家過度的社會勞務同樣影響落後國家出口，因為這些勞務不比財貨，少有自外國進口的。

福利國家為了補貼部分國內團體（如工人），而以關稅等人為方式提高進口貨物價格，以維持國內價格與進口價相等，此乃是以本國內部收入移轉以及降低從低度開發國家進口量，來達到其福利目標。

從資料顯示，福利國家的經濟成長與低度開發國家的經濟境況有很大關係，然而近年來工業國家不再以追求經濟成長為首務，綠黨勢力相當壯大，對低度開發國家的經濟不利。先進國家的經濟成長緩慢，其原因除了「工人權利」使這些國家實際收入低於潛在能力外，高稅率也因擴大了人民所得與企業所付薪資間的差距，而造成私人利潤轉移到政府的結果，進而降低了工人工作的動機。作者認為成長緩慢是七〇年代後所有具社會民主思想國家共同遭遇的現象，也是近年美國瀰漫保護主義的原因，他對此大加批評，認為這些國家採行福利政策，却使這項政策的負擔轉移到低度開發國家身上。

第八章 違背國際收入移轉的案例

福利國家想藉對外援助來補償第三世界，他們採取這項作法的假定有二：(一)第三世界文化無法應付快速的經濟發展；(二)資本主義為主的國際體系，不利繁榮從富國移轉到窮國。

作者認為這二種假定都是錯的，因為：(一)落後國家的年成長率並不低，並非如前文所說它們無法適應經濟發展；(二)所有學術研究都否認有所謂第三世界經濟長期不振的說法。

基於錯誤假定的外援，實際上給第三世界帶來了傷害，其一是它造成受援國匯率升值，有害出口；其二是它「允許」受援政府採取傷害經濟成長的政策，因為它無條件支援這些受援政府，而不考慮這些政府的政策表現。

本書作者非但認為一般援助有欠考慮，即連人道援助也值得商榷，因為人道援助的動機雖然無可非議，然而實際上，這些人道援助常常並未送到難民手上，而成為政府用於收買選票、保持權力的工具。他甚至認為由於若干國家雖然接受糧食援助數倍於過去，而國內營養不良的人口反而增加，因此並非營養不良引來食物援助，而是食物援助引來營養不良！

他在此特別稱道臺灣與南韓在美援停止後的表現。在接受美援時期，臺灣採取進口替代政策，當其知道美援將於一九六五年停止時，便預先開始採行出口擴張政策以吸引外資及技術，亦即，美援停止使得臺灣經濟政策有了激烈的轉變，由向內看本地市場取向的政策變成向外看的出口取向政策，因而締造了臺灣的「經濟奇蹟」。

對第三世界經濟持悲觀看法最甚的，莫過於布蘭德委員會（Brandt Commission），這個委員會由多位世界各國的卸任總理組成，他們建議援助第三世界的着眼點是為沖淡未來東西衝突，而以改善當地的貧窮為手段。但是布蘭德委員會在其所提的報告中所建議採行的，却是世界政府式的方案——要求國際自動分攤盈餘、徵收國際收入稅、並建立債務國與債權國「地位平等」的世界發展基金，作者以為這些作法所要求的是具世界政府的權威機構，而一般國家完全是依其志願來轉移收入的，所以這些建議不啻是要美國無條件的支付第三世界更多的錢而已。然而第三世界所最需要的是經濟成長，而不是阻礙成長的國際收入移轉。

戰後西方國家逐漸了解沒有貧窮國家參與，世界秩序的順利與穩定是無法維持的，因而有了「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

創立，但由於主事者對私人部門的了解和信心不夠，它已逐漸偏離原先的目的，如今「世界銀行」更在意於移轉繁榮，而不是創造繁榮，它不計那些國家政策失當而直接幫助他們脫困。非僅如此，它還侵入了「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領域，致使後者也步上不計受援國政策妥當與否而逕予援助的後塵，作者認為這種結果絕非此兩機構應有的情形。

第九章 國際金融體系與落後國家

當前世界金融改革主要關切的問題有二，其一是支付平衡的調整 (balance of payments adjustment)，即欲了解國際支付平衡究竟是靠國內經濟調整，或是靠匯率調整來達成平衡，其二是國際流動 (international liquidity)。

就前者而言，若以支付平衡出現赤字的情形來說，為求支付平衡，一國可以採取內部調整的方式，即靠國內物價膨脹（如此不必改變匯率），或是採取外部調整的方式，即：(一)靠國外盈餘國物價膨脹（如此也不必改變匯率），或(二)靠赤字國對盈餘國的匯率貶值。顯然地，外部的方式要較簡單，但由於當事國都希望對方讓步，在此對峙情形下，赤字國顯然不利，除非像美國這種國家，由於美元在國際存底上佔重要成分，它能於六〇年代到七〇年代間迫使外國以通貨膨脹來解決其赤字，低度開發國家則無此力量，而其是否不干預國際勞工競爭（如採關稅等保護措施）以達成支付平衡，是極其重要的問題。

但如此並非即表示低度開發國家為享受國際勞工競爭的成果，需要忍受緊縮政策，他們也可靠匯率貶值的外部方式來調整支付平衡。

與固定匯率制度比較，浮動匯率制度對低度開發國家有利，第一，由於沒有一種外匯制度能阻止國內金融當局膨脹國內貨幣的打算，浮動匯率至少能阻止保護主義者藉干預國際匯兌以維持國際支付平衡外貌的作法。第二，浮動匯率將低度開發國家和國外金融的不穩定隔離開來。許多低度開發國家都是小而開放的經濟，如果採用固定匯率制度，主要經濟國家的通貨膨脹也會造成低度開發國家的通貨膨脹，若採取浮動匯率制度，由於國外通貨膨脹使匯率上升高過國內物價上升，可將低度開發國家與國外的通貨膨脹隔離開來。

再就國際流動而言，它包含了三個要素：結構、數量及國際存底的分佈。第三世界及其支持者對此問題特別具有興趣。

戰後所採的布列頓森林制度 (Bretton Woods System) 靠著美金對黃金穩定的兌換價格得以長期持續，惟自六〇年代中期起，美國為應付越戰，大量發行美金，美金兌換的能力下降，布列頓森林制度變成「受控制的浮動」(managed floating)，也因此促成另外的存底資產出現，如德國馬克，但最受注目，尤其是受第三世界注目的就是「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所創造的國際信用貨幣——特別提款權 (Special Drawing Rights, or SDRs)。這種無中生有 (Something for nothing) 的錢由於便於用來援助低度開發國家進行發展，故有所謂「特別提款權連繫」(SDR-link)的說法。

作者反對這一為布蘭德委員會所支持的方案，因為這個方案是具有通貨膨脹傾向的：從「貨幣學派」(monetarist)的觀點來看，這個新創的存底增加了世界貨幣存積，却未創造世界的產出，必定會提高世界的物價；從「動機」的觀點來看，如果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穩定，支付平衡沒有重大問題，是不會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會以「特別提款權」所提供的發展援助，因此，此舉不啻鼓勵了那些鹵莽地採取通貨膨脹政策的國家。

總之，作者反對國際貨幣基金會走向超國家化的制度（即扮演世界中央銀行），因為那很容易政治化，而讓中共這類不去分擔健全西方經濟目標的「國家」入會，因此他力促美國降低通貨膨脹，回復美金在國際存底資產上的地位，至於第三世界，作者則認為應採取赤字控制的作法，因為如此可防範來自國外的通貨膨脹。

第十章 沒有援助情況下的經濟發展：結語

這本書的主題只有一個：第三世界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就是大政府。北方工業國家實行大政府固然使得落後國家連帶受苦，但第三世界的核心問題不在於要外在世界來配合它的需要，而是在於國內如何建立適合成長的政策環境。四小龍在過去二十年來能表現突出，克服萬難，若說有什麼秘訣，即在了解沒有一個經濟環境能在受大政府觀念麻痺後還能繁榮的。

大政府摧毀經濟的方式不一而足，第一，它將稀少資源從具生產功用的私人部門拿開。而自第三世界的經驗看來，社會民主派主張以公共部門作為成長火車頭的看法已完全被推翻，當大多數人民無力負擔公共設施時，政府却大量興建公共設施，將使許多中小企業倒閉。

其次，大政府中的福利國家觀念使得企業的勞工成本增加，進而促使私人公司轉而投資節省勞工的企業，對於勞力充沛的第三世界，大政府不啻在鼓勵他們違背比較利益的原則。尤其令人不解的，許多落後國家都不顧他們充沛的勞動力條件，而要建立自己的基本重工業，就算他們是模仿某些典型，如蘇聯模式，但這仍是違反比較利益與經濟常識的。

再次，大政府推動社會正義或收入重分配的政策，也造成第三世界的損失：政府常為顧及政治承諾而不管經濟狀況地去推動福利支出。那些原為照顧貧富不均而實行收入重分配的国家，經濟成長的紀錄都很差，倒是像四小龍這些厲行成長取向的国家反因人民生活水準普遍提高而降低了貧富之間的緊張。

大政府的弊病既已了解，則外援(Foreign aid)的不當也很清楚：對捐助國家而言，外援形成大政府補貼出口或支援外交政策的另一個方式，對受援國而言，外援使大政府追求的政策，傷害了具競爭力的部門。

本書作者深信，沒有外援的經濟發展絕非口號，它是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如要經濟迅速成長，就不能和需要向競爭力單位抽稅的外援及大政府為伍。作者一再舉臺灣及南韓在美援停止後改變政策獲致繁榮的例子，說明市場經濟仍是對付貧窮最有力的辦法。